

中韩

『

劫机外交

』

卓长仁劫机案与汉城谈判内幕

王仪轩、许光建等口述

当代中国口述史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阮虹 访谈/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中国口述史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王仪轩、许光建等口述

中韩“劫机外交”

卓长仁劫机案与汉城谈判内幕

阮虹 访谈/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韩“劫机外交”：卓长仁劫机案与汉城谈判内幕/王仪轩、许光建等口述.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10
(当代中国口述史)
ISBN 978-7-80170-712-3

I. 中… II. ①王…②许… III. 口述实录—历史事件—中韩关系 IV. K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131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陈捷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9.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9 幅 9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引 言 / 1

一、案 发 / 3

1983年5月5日 / 4

王仪轩：我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打了十来发子弹。子弹落到了我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

卢瑞龄：当我赶到总调度室的时候，那架飞机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又过了一会儿，飞机从屏幕上消失了，我们开始猜测，它可能发生意外了……

王仪轩：半路上，卓长仁把我们伤员擦血的毛巾拿过来放在了操作台上，我用余光看了一下，白毛巾上全是血。他警告我说：“你要不听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下场！咱们同归于尽！……”

二、汉城谈判 / 31

1983年5月6日 / 32

卢瑞龄：中午休会的时候，金彻荣的电报终于过来了，不出我们所料，南朝鲜方面果然同意我们去汉城谈判，而且他们还建议由我们外交部的高级代表随行……

王仪轩：他们一听我同意了，就又把单独带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已经等着两个穿黑长袍的人了，其中的一个还提着打字机。这两个人都是法官，是专门来问讯的……

1983年5月7日 / 39

卢瑞龄：为了处理劫机事件，我们开通了和大丘飞行情报区之间的联系，这在两国间还是第一次……

许光建：南朝鲜和台湾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不仅有“使馆”在那边，而且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们又派了好多特务过去，准备在旅客当中搞策反……

蒋正才：我们的飞机刚一降落在金浦国际机场，南朝鲜方面就上来两个人，说先要把组长接走，这太突然了，而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1983年5月8日 / 70

卢瑞龄：下午的谈判是从4点钟开始的，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引渡劫机犯。这一轮谈判的气氛和上午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彼此用的还是外交辞令，但是争论却非常激烈……

许光建：我们本来以为，把劫机犯的问题挂起来以后，其他的就没有多大问题了，但是没想到孔鲁明说，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恐怕要签一个书面的东西吧……

钱文荣：他们在这个东西里面一家伙写了9个“大韩民国”，你不是不承认我“大韩民国”吗？那我就给你放它9个……

1983年5月9日 / 78

卢瑞龄：我跟他们谈判的时候，人家问我：“那你们叫我们什么？”我就按照外交部的口径说：“南朝鲜！”对方一听就反驳说：“那你是中共！”……

蒋正才：双方都是你来我往，互相说点好听的，但最后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大韩民国”抹掉，对方还是要吧“大韩民国”写上，就这样相持不下……

钱文荣：我又给国内写了一份报告，还是请示中央应该怎么办。结果没想到，南朝鲜方面偏偏在这个时候不让我们和国内联系了，他们拒绝给我发电报……

1983年5月10日 / 87

卢瑞龄：会议厅里挤满了人，大家脸上的表情都比较轻松。沈局长和孔鲁明在文件上签字以后，全场热烈鼓掌。

蒋正才：南朝鲜方面从一开始就希望通过这次事件和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外交接触，这个目的他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许光建：登机之前，孔鲁明在下面等着，和工作组的成员一一握手，到了跟我握手的时候，他笑了一下，然后说：“我知道你是外交部的。”……

三、结局及影响 / 101

王仪轩：大概是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机组的全体人员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民航局召开的表彰大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国务委员谷牧专门会见了我们。

卢瑞龄：这次事件处理完以后，大韩航空公司一直和我们民航局保持着联系。特别是董事长赵重勋，到中国来过很多次。

许光建：说实在的，我们通过这次接触，对南朝鲜方面也有了一些好感，或者说慢慢地有了一些好感，因为我们发现他们是真诚的……

蒋正才：这次谈判以后，中国与南朝鲜之间的间接贸易就开始了，在外交方面，南朝鲜也表现得更积极了，他们的那些大使、参赞见到我们的外交官都热情得很！我见到的很多大使都跟我这样说，而且觉得彼此也谈得来……

钱文荣：卓长仁事件为中韩关系的发展开了一个头，提供了一个契机，而且当初参与谈判的那批人，后来对中韩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83~2001年追记 / 119

中国机场安检工作的加强及空中警察队伍的建立 / 119

中国紧急处置劫机事件基本原则的制定及完善 / 122

中韩关系的后续发展 / 126

台湾在向大陆遣返劫机犯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及卓长仁等人的历史结局 / 130

采访手记：感受历史的辩证法则 / 142

引言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着波澜壮阔的变革的国度，因而有理由被人们铭记的大事数不胜数。不过，倘若检索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记忆图谱，卓长仁劫机案肯定在其中留下了不浅的印痕，尽管它远算不上是一件大事。

人们的记忆牢度往往和相关事件冲击力的大小成正比关系，而对生活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人来说，卓长仁劫机案无疑是具有强悍冲击力的。不夸张地说，它的发生，击碎了当时无数中国人的一个维持了多年的关于自己国家的美好认知，即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纯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可能发生像在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那样罪恶的劫机案件。毫无疑问，它是一系列足以引发国人重新审视自我，特别是审视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复杂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除去这种发生在观念层面的看不见的冲击以外，它在当时还带给人们一个巨大的现实悬念，那就是中国将如何破解由于该案发生而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外交难题——让被劫持飞机和机上人员从一个与中国没有任何外交联系，并且一直被划归为敌对阵营的国家安全返回。即使撇开这些都不谈，仅仅是作为发生在中国的第一起令人发指的、过程惊心动魄的劫机案件，它也足以刺激起公众的发乎人类本能的好奇心……所有这些因素，不仅使卓长仁劫机案轰动一时，还使它在后来的岁月里被人们清晰地记忆。即使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对该案保持着浓厚的探究兴趣。

正因为如此，二十多年来，不断有人试图彻底打开本案所留下的历史“黑匣子”。然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本案的文字记载，对卓长仁等人的劫机动因及其策划劫机活动的犯罪过程都有完整交代，但对当时发生在驾驶舱里的一幕以及对后来中韩之间谈判过程的记录却嫌支离破碎，且有失真之处。因此，继续挖掘后两部分的历史内幕，同时还原失真的细节，便成了写作本书的缘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个后来被收进很多部国际法教科书的经典案例，只是一个有着明确起止时间的相对孤立的突发事件，但是，本书所提供的记录却告诉我们，它更像是一块分量不轻的石头，当它被扔进历史的长河之后，它所激起的涟漪，在后来的很多年间我们仍能不断找到……

1

中韩“劫机外交”

案发

1982年2月2日，一架中国民航客机在朝鲜半岛上空被劫，机上20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劫至朝鲜。这架飞机是波音747-200型，注册号为B-2411，由北京飞往平壤。飞机在飞行途中被劫，劫机者要求飞机飞往朝鲜。飞机最终在朝鲜半岛南部被劫，机上20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劫至朝鲜。这架飞机是波音747-200型，注册号为B-2411，由北京飞往平壤。飞机在飞行途中被劫，劫机者要求飞机飞往朝鲜。飞机最终在朝鲜半岛南部被劫，机上20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劫至朝鲜。

（1982年2月2日）

1983年5月5日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天上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武装暴徒安卫建等数人劫持，被迫于当日13时10分在南朝鲜汉城*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降落。

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是今日上午10时40分由沈阳起飞去上海的。

春川机场在汉城东北约80公里。据外电报道，这是美军的一个军事基地。

据了解，这架客机载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

——1983年5月6日《人民日报》

★阅读链接

南朝鲜：中国与韩国建交前对后者的称谓。旨在表明中国只承认朝鲜政权，不承认南朝鲜政权的外交立场。北、南双方互不接触、互不承认始自1945年，此后，其他国家均根据自身倾向使用对双方的称谓。1992年中韩建交后，中国改称南朝鲜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出于尊重历史事实，本书在引用的当年中国媒体报道和当事人口述中保留了“南朝鲜”称谓，特此

沈阳

1983年5月5日，星期四。

早上6点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早间的全国新闻节目。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安国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院院长。

安卫建是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等行为，数次被警方拘捕。那么，他这次的不辞而别，会不会是又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这个可怕的推断让院长也陷入了极度不安。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检查的结果令人大惊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美制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消失！

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安卫建的密友姜洪军也同时失踪！姜和安卫建一样声名狼藉，也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

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

说明。

汉城：今译首尔，韩国首都，正式名称为首尔特别市，旧称“汉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改称“京城”。韩国独立后于1946年改称首尔（音），意即“首都”或“京城”。但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国内及国外华人社会仍使用“汉城”旧称。2005年10月，按照韩方希望，并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有关外国地名翻译使用规定，中国启用“首尔”这一新译名。同样为尊重历史事实，本书依然保留了劫机案发生时所使用的“汉城”称谓，特此说明。

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其他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上午9点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

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

10点整，案情被报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11点40分，市公安局向该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

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得逞的恶性劫机案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

■口述实录

王仪轩，296号航班机长。男，1940年生，辽宁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后曾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总飞行师、中



国民航东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

王仪轩：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83年5月5号，那是我飞行生涯中，或者说是我一生经历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那天，我们要飞沈阳—上海—哈尔滨—上海—沈阳这个航班，当然，航班号也是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的——296，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三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我那时候是飞行大队长，同时也是教员，飞行的时候就是机长。这个航班的线路比较长，大概每星期飞一次。那次我飞这个航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要考察我们的一个机长，他叫和长林。他以前只是在白天放过单飞，因为这趟航班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夜航，所以刚好可以考察他的夜航能力，如果他通过考察了，就能够全天候放单飞了。

296号航班原定是8点20分起飞的，但是我上了飞机以后，开车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点故障。于是，我马上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飞机打开舱门以后，我们机组有人从飞机上走下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插曲曾经让几个劫机犯非常紧张，他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阅读链接

“三叉戟”飞机：英文名 Trident，由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后并入英国宇航公司）于1962年1月9日推出的短/中程喷气客机，属第二代喷气客机的早期机型。能运载乘客百余名左右，最大航程1300公里。因飞机上拥有三套独立的飞行控制系统和三台喷气发动机而得名。该机共生产了117架，数量偏少，主要用户为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EA）。中国曾于20世纪70年代初大量引进该机，中国空军和中国民航先后购买了35架，占其全部产量的30%。1974年，中国民航开始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始发的15条国内航线上陆续使用该机，至1991年10月31日全部退役。在该机进入中国的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围绕它曾多次爆出“重大新闻”，其中包括1971年震惊全国的林彪等人驾机叛逃并在蒙古温都尔罕地区坠毁的“9·13事件”、1982年在桂林附近恭城崩山西北坡撞山坠毁并致机上10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的“4·26”空难，以及1983年发生的本案。

大约 10 点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机组人员重新回到飞机上准备起飞。我们正式起飞的时间是 10 点 49 分。

296 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 9 个，其中有 3 名乘务员，另外 6 个人都在我们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的有两个，我和和长林，还有两个领航员、一个报务员和一个机务人员*。

我们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我们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我就对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王培富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他就说：“后面第三排的那六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一直在嘀嘀咕咕的。”我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另外，我们在前面还放了几个汽水瓶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当武器。

★阅读链接

296号航班机组成员：王仪轩（飞行大队长、机长）、和长林（副驾驶）、王永昌（报务员）、王培富（领航员）、林国荣（领航员）、冯云武（机务员）、程梅（乘务员）、姜民英（乘务员）、李霞（乘务员）。

、未遂劫机事件：指发生于 1982 年 7 月 25 日中国民航 2505 号航班由西安飞往上海途中的劫机事件。该航班由中国民航兰州管理局第八飞行大队杨继海机组驾驶。当五名劫机者试图将飞机劫往台湾时，机组人员与其斗智斗勇，最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五名劫机者后均被判处死刑。杨继海机组被国务院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

大家把工具拿出来以后，我又嘱咐把门锁上。正这样说着的时候，我们身后就有动静了——有人想要闯进驾驶舱。就在这个时候，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我们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他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赶到后舱按警报铃，我们前面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

我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他们就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吧。子弹落到了我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还有木头屑子。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一踹，门开了。其实驾驶舱的门是很薄的，就是普通的三合板，这主要是为了减轻飞机自身的重量。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准备了，所以靠门的两个人一看到门被踢开了，马上就举起棒子和消防斧要打。但是机舱里的空间太小了，棒子和消防斧都举不起来，人也施展不开。劫机犯一看我们要打就开枪了，把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都打伤了。

我们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我们驾驶舱里原来有六个人，现在四个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了我和和长林两个人。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我和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我们一看没用，就让飞机紧急下降，因为我们要尽快想办法着陆。虽然地面的情况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根据经验，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在渤海湾上空。没想到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我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48度！汉城！”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我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呀！他懂行呀！我当时就是

这么个感觉。这个人就是卓长仁*。后来我才知道，他果然比较懂行，因为他上过航校，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

我们的飞机本来就在紧急下降，卓长仁一推驾驶杆，飞机就下降得更快了，实际上已经是在往下俯冲了。劫机前我们在云上9000米，他这一推就到了云下。在云下也看不见地面，因为海上有雾，全是雾。这时候因为飞机在超速往下俯冲，速度太快了，飞机上的警报器就响了，警报灯也亮了，但是当时情况太紧张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等我最后反应过来的时候，一看飞机的高度已经很低了。我大致算了一下，那时候每分钟的下降速度超过了6000英尺，因为显示下降率的表已经指到头了，也就是说已经超过6000英尺了，究竟是7000英尺、8000英尺，还是更多已经不知道了。我一看这种情况，赶快向上拉。那时候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可能还剩3000多英尺、不到4000英尺的样子，而且拉的过程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因为向上拉的时候飞机不能直接就起来，还要继续下冲一段距离，所以，如

★阅读链接

卓长仁：“五五”劫机案主犯。原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曾长期往返于广州、沈阳等地，从事倒卖汽车、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活动，在当地有“汽车大王”之称。1982年3月，辽宁省政法机关根据举报，将其犯罪活动列为全省经济犯罪大案要案之一。1982年9月，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对其做出了停职审查的决定，并准备依法逮捕法办。为逃避法律制裁，卓伙同曾长期参与其投机倒把活动的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及情妇高东萍等五人计划劫机外逃。卓组织五人事先收集了飞行地图，并通过关系多次到沈阳警备区和沈阳军分区靶场进行射击训练。1983年5月3日，卓利用其手中的空白介绍信，通过沈阳东塔机场的熟人，用化名购买了6张机票。4日，卓又指使在沈阳体育学院保卫部门任职的姜、安二人，盗取了该部门的4支美制手枪。5日，卓等人将手枪藏匿在事先准备好的几台金属仪器中通过了机场的安全检查，并于飞机飞行至大连上空时实施了本案。